

当代中国大学中的 教育分层

AFTER DEFYING THE ODDS

Th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龙门』之后

朱 斌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龙门』之后

当代中国大学中的
教育分层

AFTER DEFYING THE ODDS

Th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柴斌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门”之后：当代中国大学中的教育分层 / 朱斌
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
ISBN 978 - 7 - 5201 - 4506 - 0

I. ①龙… II. ①朱… III. ①高等教育 - 社会影响 -
研究 - 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8561 号

“龙门”之后：当代中国大学中的教育分层

著 者 / 朱 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杨 阳 马云馨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5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506 - 0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18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
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导言	001
一	问题的提出	001
二	“龙门”之后	005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010
一	理论研究	011
二	经验研究	019
三	文献述评	024
四	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0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036
一	数据介绍	036
二	核心变量	041
三	研究模型	048
第四章	再生产的首要路径：文化资本	050
一	文化再生产机制	051
二	资源转化机制	060
三	研究变量	063
四	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	067
五	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	077
六	结论	082



第五章	再生产的次要路径：毕业选择期望	085
一	升学意愿的阶层差异	086
二	工作期望的阶层差异	095
三	研究方法	099
四	结果分析：升学意愿	105
五	结果分析：工作期望	115
六	结论	124
第六章	首要路径与次要路径的相互影响	126
一	教育成就对毕业选择期望的影响	127
二	毕业选择期望对教育成就的影响	133
三	结论	136
第七章	大学生的毕业结果	138
一	研究假设	139
二	数据与变量	144
三	研究结果	149
四	结论	166
第八章	结论	168
一	流动的差异：录取、过程与结果	168
二	“龙门”之后：关于社会流动趋势的讨论	173
参考文献		178
附录		204
后记		208

第一章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哪个社会，社会分层始终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始终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相关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凸显和扩散。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 2003 年以来已经连续 15 年维持在 0.45 以上，远远高于 1980 年的 0.23^①。特别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关于“官二代”“富二代”的公共事件，使得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成为社会大众的热议话题。

而在所有的社会分层中，教育分层尤为受人关注，教育问题一旦发生，往往就是触及心理底线的社会问题。2018 年，浙江省教育部门擅自对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省委决定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省政府调查组才得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以解决。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有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尚不到20%，此后教育的影响则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了80%以上（Massey，2007：254）。在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就是普通百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的平民子弟往往被视为“鲤鱼跳龙门”。

正因为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不光是社会，政府对于教育公平也给予了极大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0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国家）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研究者一般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教育，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精英地位获得的阶层差异。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晨、李中清等人为

代表，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比以前大为开放，即使在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精英教育生源的多样化也得以维持，这种多样化的维持可以长期和根本性地改变中国精英阶层的社会来源，防止已经形成的社会开放性被社会再生产所迅速取代（梁晨等，2013：23）。

第二种观点认为梁晨等人使用的方法存在缺陷，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在经济改革之后是否得以维持是值得商榷的（李春玲，2014）。已有许多研究依据更为精确的方法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在改革初期有所上升，但这种差异在高等教育扩张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没有下降但也没有显著上升（刘精明，2006a；李煜，2006；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2014）。

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始终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阶段，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即使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保持了相对稳定，一个新问题仍需要我们关注，即大学中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这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大学生，大学文凭将逐渐贬值，此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被排斥出去，因此社会竞争将会延伸到大学内部而不会仅局限于大学入学时。

从图 1-1 可以看到，从 1978 年到 2017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7% 增加到 45.7%，也就是说，目前 17~19 岁青少年中，45.7% 的人能够进入大学。根据国际上的一般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 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 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 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快要进入普及化阶段。

总的来说，当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时，不到15%的人能上大学，此时大学文凭能够保证大多数大学生成为社会精英，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背景下，大学文凭的价值大大降低，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成为社会精英。这也意味着即使那些工农阶层子女能以平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他们也很可能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被精英阶层子女所排斥而不能最终实现向上流动。因此，在我们继续关注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问题时，同时也要转向“龙门”之后，即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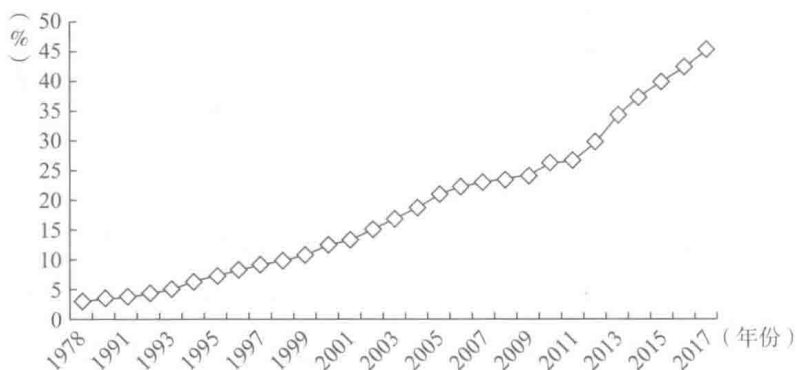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1978~2017 年）

数据来源：2001 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01 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基于上面的考虑，本书的经验问题是，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在高校内的各方面表现（统称为教育成就），以及毕业后的升学与求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阶层差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要回应一个更大的现实问题：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是否会因为大学中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而降低？如果工农阶层子女进入大学后被精英阶层子女所排斥，既不能获得好的教育成就，在升学与求职方面又没有竞争力，这意味着梁晨等人所说的“无声的革命”的胜利果实将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逐渐流失，反之则说明这场“革命”得以较好维持与延续。

二 “龙门”之后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完成，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更为充分，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家庭阶层背景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大学生最终的毕业结果：一方面，家庭阶层背景可以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进而影响他们毕业后的升学或求职，称之为首要路径；另一方面，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的升学或求职还保持着直接的积极影响，即次要路径（Boudon, 1974）。总的来说，大学是社会再生产的场域，出身精英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教育成就与毕业结果上具有显著优势（Mullen et al., 2003; Walpole, 2003; Goldrick-Rab, 2006; Bozick, 2007; Alon, 2009; Ostrove et al., 2011）。对于这一结果，冲突论是目前主要的解释范式，不过冲突论内部也是分歧林立，一些理论认为这种结果是理性选择造成的（Goldthorpe, 1996; Breen & Goldthorpe, 1997）；另一些理论则强调精英阶层家庭优越的文化资本或者阶级文化观念的作用，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 2002b; 布尔迪约，2004）与“文化抵制理论”（威利斯，2013）。

国内很少有研究讨论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李锋亮等，2006；朱新卓等，2013；李丁，2018），但有不少研究涉及家庭阶层背景与大学生毕业结果的关系。虽然少数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联系（李黎明等，2009；陈丽萍、刘森林，2015），但更多研究发现，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

学生毕业结果或多或少有着积极影响（阎凤桥、毛丹，2008；张顺、程诚，2009；李宏彬等，2012；岳昌君、杨中超，2012；岳昌君、张恺，2014）。一些研究还发现，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即随着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提高，家庭背景的作用被削弱（张顺、程诚，2009；赖德胜等，2012；黄敬宝，2015）。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大学文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逐渐贬值，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毕业结果的影响应该会更加突出。

然而，一项关于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变迁的研究显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并没有降低社会开放性，相对流动率反而有所上升（李路路、朱斌，2015）。该文的研究对象覆盖了所有成年人，笔者参照该文的研究设计对大学生初职阶层的代际流动变迁做了简单分析。笔者首先根据大学生出生年份将他们区分为三个同期群，“1960 年以前”“1960 ~ 1979 年”“1980 年以后”，其中“80 后”是大学扩招以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期群。然后使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各个同期群大学生的初职阶层代际关联系数，该系数用来衡量父代与子代之间职业阶层的关联程度，关联系数越高，说明子代职业阶层与父代职业阶层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那么社会开放性越低。具体计算过程可见附录，表 1-1 是计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初职阶层的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大幅下降，甚至与改革前差不多，这说明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初职获得的影响在大学扩招后有显著降低。该结果与上述理论预测并不一致，事实上，后文研究结果也将表明，在当前中国高校中，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教育成就和毕业结果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表 1-1 大学生初职阶层代际关联程度的变化

大学生同期群	关联系数
1960 年以前	1.000
1960 ~ 1979 年	1.970
1980 年以后	1.080

那么,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家庭阶层背景在大学中的影响呢?本书着重强调了两个因素:国家与全球化。首先,许多跨国比较研究都注意到,教育分层在不同国家并不一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程度不同(Buchmann & Hannum, 2001; Breen & Jonsson, 2005; Van de Werfhorst et al., 2010)。这一点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所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削弱包括教育分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国家都是重要力量(Hout & Diprete, 2006)。具体而言,国家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个人机会的分配机制;二是影响人们的机会结构(Zhou et al., 1996)。不同国家由于其制度结构、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影响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重要资源,形成了总体性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当然也包括教育系统(孙立平等,1994;渠敬东等,2009)。而在国家深入而积极地干预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呈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首先,中国教育系统在选拔学生的时候特别注意公开公平,因为一旦教育选拔出现问题,国家合法性就会大大受损。为了达到公开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相对更高,考核学生的内容与标准都是尽量客观化、标准化,高度的

标准化大大削弱了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故而那些工农阶层子女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好成绩（Stevenson & Baker, 1991；Muller et al., 2000；Park, 2008；Horn, 2009）。这就意味着，家庭影响的首要路径在中国高校中会得到抑制，大学生在教育成就方面总体上不会出现显著阶层差异。

其次，国家干预虽然能抑制大学生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大学中的教育分层，毕竟家庭还能够直接影响子女毕业后的升学与求职，其中一种重要的渠道就是影响子女的毕业选择期望。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毕业选择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内，随着出国留学制度障碍的消解，出国留学可能是大学生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地主要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如果毕业留在当地，那么他们能够享受更高的社会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毕业回国，在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留学经历也可以增强他们的竞争力（许家云等，2014）。

尽管如此，分析结果却显示，出国留学并不是各阶层都积极追求的选择，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只有精英阶层子女会去积极追求，这导致他们的出国留学机会远远高于工农阶层子女。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出国留学可以看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阶层再生产，但随着大量精英阶层子女出国留学并且长期留在国外（王耀辉、苗绿，2014：47），工农阶层子女在国内升学以及就业过程中的竞争有所减弱，那么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国家主导形塑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国家政策

的扶持来弥补家庭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得与精英阶层子女相当的教育成就。另一方面，虽然家庭阶层背景能够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升学和求职结果，但考虑到大量精英阶层子女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故而工农阶层子女在国内升学与就业方面拥有了更多机会，进而使得毕业结果的阶层差异有所削弱。总的来看，在国家与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下，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在高校扩招后的大学中即使存在也是比较微弱的，那么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得到延续。下文将对此展开详细的分析与论证。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第一章，笔者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中国大学是不是社会再生产的场域？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理论视角：功能论与冲突论。功能论认为学校是促进精英循环的“平衡器”，但在冲突论看来，学校则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同整个结构功能主义的衰落相联系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冲突论最终取代了功能论而成为目前教育分层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但是，冲突论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些分歧一方面体现为解释路径上的不同——结构与能动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起决定作用的家庭资本类型的差异——文化资本与非文化资本。根据不同学者强调的内容，可以区分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冲突理论，分别是文化再生产理论、资本转化理论、文化抵制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为学校中的再生产现象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解释。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关于教育分层的经验研究。通过对这些经验研究的梳理，可以勾勒出学校中再生产的具体过程：家庭阶层背景沿着两条路径——首要路径和次要路径影响大学生的毕业结果；而在每条路径上又存在两类影响机制——文化机制与非文化机制。与之相比，国内关于教

育分层的经验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一些研究探讨了毕业结果的阶层差异，而对于教育过程的阶层差异则很少涉及。

总结现有研究，一方面，现有理论通常忽视了国家的作用，要么将国家视作精英阶层的统治工具，要么将国家悬置起来，很少将其作为真正的行为主体来研究。另一方面，诸多跨国比较研究却显示，教育分层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程度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强调要将国家带回教育分层的研究中。首先是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它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干预教育系统。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将影响大学生的跨国流动选择，进而影响国内的社会流动。最后，笔者将根据上述考虑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以及基本假设，并简单介绍后面的内容安排。

一 理论研究

1. 流动还是再生产：功能论与冲突论的比较

功能论与冲突论是两种最基本的社会学理论范式，面对社会分层（包括教育分层）的持续存在，二者给出了不同解释，与之相对应的是，二者关于学校的角色也有不同的判断。

功能论的基本假设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是值得肯定的，任何社会组织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现有社会秩序的某种需要。在功能论看来，那些对社会而言功能上重要且稀缺的位置就应该由最有能力、最能胜任它的人来承担，并且赋予他们最优厚的报酬和地位。正是这种高低有序、各司其职的不